

# “东亚福利体制”的内在统一性

## ——以东亚六个国家和地区为例

万国威, 刘梦云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随着福利比较研究的逐步深入, “东亚福利体制”受到了诸多学者的支持。但另一部分学者对“东亚福利体制”究竟是否真实存在提出质疑。他们主要从体制差异、文化独立和体制分裂三个方面提出了对“东亚福利体制”内在统一性的挑战。本文在对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六个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后认为, “东亚福利体制”没有明显受到经济政治体制的影响, 具有自己独立的福利文化, 只存在内在的差异而非整体的分裂。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东亚福利体制”的内在统一性, 并回答了“东亚福利体制”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东亚福利体制”; 统一性; 东亚六地区

**中图分类号:** D6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1) 01-0001-09

### The Unity of Eastern Asian Welfare System: Concluding from Six Countries and Areas in Eastern Asia

WAN Guo-wei, LIU Meng-yun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comparison, “East Asian Welfare System” has been supported by many experts. However, as a basic issue, whether “East Asian Welfare System” really exists is also questioned by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cholars. Scholars have put forward mainly a challenge on the inner unity of “East Asian Welfare System” from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cultural in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al division. After a comparison among the Mainland of China, Japan, Korea, Singapore, Taiwan and Hong Kong of China, it suggests that the inter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does not influence “East Asian Welfare System” which has its own welfare culture and only has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without the division in the whole. This research further proves

收稿日期: 2010-10-19; 修订日期: 2010-01-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09AZD040)。

作者简介: 万国威 (1986-), 河南濮阳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

the inner unity of “East Asian Welfare System” and answers the question whether “East Asian Welfare System” exists.

**Keywords:** Eastern Asian Welfare System; unity; six areas in Eastern Asia

### 一、关于“东亚福利体制”的争议

有关“东亚福利体制”的争议实际上是对福利体制的讨论，而对福利体制进行系统研究的代表是埃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的福利国家划分。1990年，埃斯平-安德森以非商品化与社会分层状况作为主要的区分指标，将福利国家的体制划分为三种类型：保守社团主义体制（欧洲大陆体制）、自由主义体制（盎格鲁·撒克逊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北欧体制）<sup>[1]</sup>。这一分类划时代地打破了福利体制研究的停滞状态，并开启了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新路途。但是，埃斯平-安德森的研究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一种批评的声音来源于他没有将东亚与南美两个相对特殊的福利体制纳入福利体制的讨论中。他在随后的论述中改进了原有的理论，加强了对“东亚福利体制”与社会政策的论述，提出东亚福利体制“既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又是混合了全球福利国家的主要特点”<sup>[2]</sup>。

“东亚福利体制”是指在东亚地区形成且普遍存在的，区别于西方福利体制的一种具有独特发展视角的新型福利供给类型。近年来，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东亚福利体制”一般被支持者概括为具有生产主义、儒教影响和低水平三大特点。

(1) 生产主义特点。霍利德（Holliday）提出东亚福利的最重要特点是东亚的福利倾向于将生产或经济目标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并将福利政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子课题进行研究<sup>[3]</sup>。高夫（Gough）在对“东亚福利体制”的概括中尤其强调生产性的特点，他认为东亚福利政策的推动围绕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福利体制的选择也围绕着经济的发展目标展开，因此，东亚福利政策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具体体制与经济生产保持了密切的关系<sup>[4]</sup>。

(2) 儒教影响特点。琼斯（Jones）提出“儒教福利国家”的概念，强调儒教作为东亚福利体制的文化整合因素所发挥的巨大作用<sup>[5]</sup>。林卡继承与发展了琼斯的有关理论，提出东亚体制应当是“儒学文化圈中的福利体系丛”<sup>[6]</sup>。韩国学者林炳铨等人也认为儒家文化对于“东亚福利体制”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东亚福利体制”也在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建立起和西方相区别的独立体制<sup>[7]</sup>。

(3) 低水平特点。古德曼（Goodman）在概括东亚体制时使用了“日本式福利国家”的概念，通过对日本社会福利体制的概括与研究，对“东亚福利体制”的低水平进行了有益挖掘<sup>[8]</sup>。哈克（Huck）指出国家是监督者而非供给者、福利的分散化、福利再分配的低水平是“东亚福利体制”的最主要特点<sup>[9]</sup>。李易骏等人则认为“东亚福利体制”具有低社会安全支出和低年金覆盖率、高福利阶层化、高社会投资支出和高社会福利承担责任的特征<sup>[10]</sup>。

而“东亚福利体制”概念的反对者则将制度差异、福利文化、内部分裂三个质疑作为反对要点。有关“东亚福利体制”存在与否的争议也围绕上述问题在两方阵营中展开。反对“东亚福利体制”真实存在的学者们在质疑的过程中，一般具有以下三点考虑。

(1)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不同使“东亚福利体制”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趋势。米什拉（Mishra）认为，东亚各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较大差异。各国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而尽管东亚福利作为模糊的整体与西方社会福利体制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东亚福利体制”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仍然相当勉强<sup>[11]</sup>。同时，东亚各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有所不同：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发放与负担的两个方面还有需要解决的问题；韩国少子老龄化与社会保障的效率化是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大陆城市的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问题，农村的医疗、卫生和保健服务问题亟需解决<sup>[12]</sup>。

(2) 东亚的国家与地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福利文化。东亚地区尽管受到强烈的儒家文化影响,但是从福利文化的建设看,缺乏一体化的福利理论与福利思想,没有形成统一的福利建设理念。熊跃根在考察了中日韩福利范式的基础上认为,作为东亚国家,中日韩的福利范式并不是同一个类型,虽然人们笼统地将三者归类为“东亚福利体制”,但其仍然有自身鲜明的特殊性,这些差异与各国不同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sup>[13]</sup>。

(3) “东亚福利体制”内部也有很多分裂。“东亚福利体制”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也可以划分为很多小类型,这就为“东亚福利体制”整体性建构提出了挑战。有学者对东亚福利体制内部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认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福利体制具有保守主义的、再分配、民主的特色;而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福利体制则具有强制的、残余主义的、威权主义的色彩<sup>[14]</sup>。

## 二、研究的基本问题及设计

### 1. 研究问题

“东亚福利体制”是否真实存在的争论是关系到“东亚福利体制”问题的核心议题。所以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是分析“东亚福利体制”的基础步骤。对“东亚福利体制”是否存在的探讨,需要着重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与西方三大福利体制、拉美福利体制相比,“东亚福利体制”是否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第二个问题是“东亚福利体制”内部各个国家与地区是不是具有统一的特点。

目前,“东亚福利体制”的外在独立性在学术界研究较多,学者们一般将生产性福利、新公共性、家庭中心、儒教文化圈作为“东亚福利体制”区别于西方福利体制和拉美福利体制的一般特征<sup>[15-17]</sup>。而从质疑东亚社会福利存在的主流声音看,其怀疑的主要方面也针对东亚福利体制内部是否具有内在统一性。所以,对“东亚福利体制”是否真实存在的命题主要是对“东亚福利体制”内在统一性的考量,而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本文意图在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回答学者们广泛质疑的三个问题:①东亚经济、政治体制的不同使“东亚福利体制”是否呈现出一种分裂化的状态?②“东亚福利体制”内部有没有形成自己的福利文化?③“东亚福利体制”内部是否存在诸多分裂的小体制?

### 2. 研究设计

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福利的比较研究,而进行社会福利的国际比较研究,首先需要建立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单位<sup>[18]</sup>,其次是确立比较研究的内容。尽管中国大陆所采取的社会福利概念、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的社会福利概念、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概念在内容上有很多的区别,但是广义社会福利的内容在总体上相当接近。所以,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本次研究也采用广义的社会福利概念,即社会福利既包括以货币形式帮助社会群体解决需要满足问题的核心制度,也包括通过提供劳务、实物和其他形式的服务满足社会成员社会需要的行动。

从比较研究的内容看,本次研究的分析预先假定“东亚福利体制”的存在,并选择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六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分析对象。在“东亚福利体制”统一性问题的分析中,本研究主要从政治与经济体制、福利文化建构、内部福利类型三个方面对东亚六个国家和地区的福利状况进行分析,以验证“东亚福利体制”的内在统一性。

## 三 “东亚福利体制”的内在统一性

### 1. 经济政治体制与东亚体制

按照部分学者的看法,“东亚福利体制”不应当称为一个统一的体制,其重要原因在于“东亚福利体制”内部各个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诸多差异<sup>[19-21]</sup>。所以本文首先考察经济、政治体制对东亚体制统一性的影响。

(1) 经济体制与福利建设。由于中日韩在经济体制上具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东亚福利体制”

内部基于经济体制的分野而产生的福利体制的分裂就成为学者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同时，中日韩经济发展水平上的较大差别，也对直接进行同层面、同时期的福利分析造成了诸多困难。因此，将福利发展历史与经济体制进行对照分析，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详见表1和表2）。

表1 中日韩福利建设、福利走向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中国			日本			韩国		
福利阶段	福利走向	经济增长	福利阶段	福利走向	经济增长	福利阶段	福利走向	经济增长
奠基阶段	上升	上升	奠基阶段	上升	显著增长	奠基阶段	上升	缓慢上升
衰退阶段	下降	显著下降	高速增长	高速增长	显著增长	高速增长	高速增长	上升
转轨阶段	平行	显著上升	调整阶段	急速降低	下降	萎缩阶段	急速下降	显著上升
调整阶段	上升	显著上升	改革阶段	缓慢上升	缓慢上升	暴增阶段	高速增长	上升
新时期	上升	显著上升	新阶段	缓慢上升	缓慢上升	停滞阶段	下降	缓慢上升
						改革时期	缓慢上升	缓慢上升
						新时期	缓慢上升	缓慢上升

注：经济增长根据这一时期的平均GDP增速确定。

表2 中日韩福利建设、福利走向和经济体制的关系

中国			日本			韩国		
福利阶段	福利走向	经济体制	福利阶段	福利走向	经济体制	福利阶段	福利走向	经济体制
奠基阶段	上升	计划经济	奠基阶段	上升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奠基阶段	上升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衰退阶段	下降		高速增长	高速增长		高速增长	高速增长	
转轨阶段	平行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调整阶段	急速降低		萎缩阶段	急速下降	
调整阶段	上升		改革阶段	缓慢上升		暴增阶段	高速增长	
新时期	上升		新时期	缓慢上升		停滞阶段	下降	
						改革时期	缓慢上升	
						新阶段	缓慢上升	

如表1和表2所示，经济体制对中日韩的影响并不是特别显著，而经济发展走向对其福利的影响则更为明显。除了韩国威权政府时期出现的异常现象，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福利的供给也会得到应有的提升与改善。经济体制的差异尽管存在，但是中日韩在经济与福利的关系上却无明显区别，经济体制对不同所有制国家的影响较为有限。

从中日韩福利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尽管他们在社会福利发展的阶段略有差异，但是整体来看其福利历史的阶段性有大范围的重合。从福利发展的年代上看，随着国际化的日益加强，中日韩社会福利的改革和调整时间也相当接近。在福利上升期间，福利的供给会有比较迅猛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福利的构建力度也会相应下降。尽管中国的发展路径与日本和韩国相比略有差异，但是在各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中日韩的福利与经济均有良好的呼应。1960~1978年间，日本经济出现了巨大的腾飞，福利的发展也呈现了高速增长的态势；韩国也在威权政府没有当选且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出现了福利的显著增长；同样，中国通过1977~2010年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使福利得到迅速发展。如果从福利发展阶段、福利走向、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的变化情况看，中日韩的福利构建与经济增长呈现密切的关系，和经济体制呈现了弱关系。

(2) 政治体制与福利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到2010年的60年间，中日韩福利的趋势呈现较为一致的走向。尽管发展道路不尽相同，但是中日韩的福利在市场取向与国家取向的波动中呈现了相类似的发展态势。

分析发现，中日韩的福利构建呈现了相对一致的阶段性特征，尽管在波动的程度、国家取向和市场取向的偏好上有一定的时代差异，但是基本的福利构建趋势和走向是较为吻合的。这就可以印证，从政治体制与福利建设的关系角度，两者没有非常显著的联系。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分析政治体制对福利构建的作用，本文还区分了不同时期福利发展、福利走向与政治体制、政治整合的关系，详见表3。

表3 中日韩福利发展、福利走向与政治体制的关系

中国			日本			韩国		
福利阶段	福利走向	政治体制	福利阶段	福利走向	政治体制	福利阶段	福利走向	政治体制
奠基阶段	上升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体制	奠基阶段	上升	一党独大民主体制(或“55体制”)	奠基阶段	上升	威权体制
衰退阶段	下降		高速增长	高速增长		高速增长	高速增长	
转轨阶段	平行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体制	调整阶段	急速降低		萎缩阶段	急速下降	
调整阶段	上升		改革阶段	缓慢上升		暴增阶段	高速增长	民主体制
新时期	上升		新阶段	缓慢上升	民主体制	停滞阶段	下降	
						改革时期	缓慢上升	
						新时期	缓慢上升	

从福利发展、福利走向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看，其内部没有明晰的联系。中国大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较为集权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个是较为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但是在福利供给方面，似乎没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性。日本在自民党执政的几十年中，也出现了很多的福利走向的上升与下降，所以也很难用政治体制不同来回应福利发展的问题。可以说，社会福利构建与政治体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真正影响福利发展的是各个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见表4）。在60多年社会福利的变化中，中国大陆的福利波动幅度最小，日本的福利波动最大，而韩国的福利转变阶段则最多。这是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在政治上的波动性较小，既有的政策较少产生剧烈变化。而日本的政局动荡较韩国虽缓和，但却受到西方社会的深刻影响，石油危机造成了日本政治整合方面的诸多变化，在福利的供给中也有所反映。韩国的威权政府与民主政府争端非常剧烈，由于社会控制而引发的福利大战对韩国福利转轨造成了较多的影响。

表4 中日韩三国福利发展、福利走向和政治整合的关系

中国			日本			韩国		
福利阶段	福利走向	政治整合	福利阶段	福利走向	政治整合	福利阶段	福利走向	政治整合
奠基阶段	上升	强	奠基阶段	上升	弱	奠基阶段	上升	弱
衰退阶段	下降	强	高速增长	高速增长	强	高速增长	高速增长	强
转轨阶段	平行	弱	调整阶段	急速降低	强	萎缩阶段	急速下降	强
调整阶段	上升	强	改革阶段	缓慢上升	弱	暴增阶段	高速增长	强
新时期	上升	强	新阶段	缓慢上升	弱	停滞阶段	下降	强
						改革时期	缓慢上升	强
						新时期	缓慢上升	强

## 2. 福利文化与东亚体制

“东亚福利体制”的福利文化是否趋于成熟，是关系到“东亚福利体制”是否具有统一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福利建设从本质上要与福利文化保持某种联系，如果一个福利体制不能够具备相应的福利文化，那么福利在构建的过程中势必会受到福利文化与民众期待的干扰。

(1) 家庭互济的福利文化。从东亚国家构建福利的历史看，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儒教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在福利文化中充分强调了家庭的中心作用。以中日韩为例，通过对他们福利构建的分析，可以发现家庭在福利中的强大作用以及东亚相对统一的福利文化（见表5）。

表5 中日韩三国福利中家庭的作用

国家	时期	时代特征	代表性制度	家庭的作用
中国	改革开放前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	五保 “农业 16 条”	“国家—集体经济—家庭”的福利体系，家庭承担了福利互济的作用，并作为福利基本单位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后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福利	低保、扶贫开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以家庭作为福利建设的重要主体，并以家庭为单位为贫困人群考核和提供福利，家庭的互济作用非常明显
日本	石油危机前	西方福利的发展思路	国民年金计划	经济发展高于社会保障的整体发展水平，以家庭为中心、以年金计划为基本方式来建设社会保障制度
	石油危机后	日本式福利的发展思路	《雇佣机会均等法》、社会保险制度改革	在危机之初强调个人、家庭、企业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发展思路，福利政策转向缩小国家责任，后期强调家庭的福利作用
韩国	民主政府前	低福利时期	《生活保护法》、《国民福利年金法》	强调“劳动意识”和“生产自救”，强调家庭在维持生活方面的基础作用和核心职能，社会普遍认为赡养老人是家庭责任
	民主政府期	福利的波动	国民年金制度、雇佣保险制度	主张以家庭为中心的劳动福利，强调生产和家庭的作用，作为福利多元化的主体，家庭作用被突出出来

中国大陆在早期福利构建的过程中，通过“国家—集体经济—家庭”的福利体系实现对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具体为在城市通过限价供应、充分就业和单位报销等制度保障家庭主要劳动人口的收入，并通过家庭互济实现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而在农村地区，国家支持集体经济的发展，并通过集体经济的运作和家庭互济来实现农村人口的保障。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的作用进一步突出。随着集体经济的衰落，国家通过加大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的力度来实现体系化的风险防范。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核心政策均在实践中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操作。可见，在中国福利的构建过程中，家庭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日本在石油危机前尤其注重学习西方国家，大力发展福利，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的社会福利支出出现了很大的增长。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日本国民福利还是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日本制定了国民年金制度，并且通过制度化的收入保证和家庭的互济作用实现国民福利的最大化。1973年随着日本年金制度与医疗保障制度的大规模建立，日本的社会福利出现了增长的最高值。但在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日本强调个人、家庭、企业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发展思路，福利政策转向缩小国家责任，家庭的责任被放在了建设的首位。20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经济的低迷，日本进一步强调家庭的福利主体地位，并探索将社会福利与家庭福利进行有力结合的新体制。

韩国的福利建设在民主改革之前特别强调“劳动意识”和“生产自救”，强调家庭在维持生活方面的基础作用和核心职能。社会普遍认为抚养老人、养育儿童是家庭责任，因此，养老、育儿等制度在福利建设方面并没有得到高度重视。仅有的维持基本生活的福利，也保持着相当低的福利水平。高储蓄被运用于经济发展，因此，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风险也在逐步升高。民主改革之后，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政府开始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慈善管理等方面启动相关社会政策。但是，家庭的作用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应多元福利的要求呈现越发重要的作用，并在金泳三政府期间达到高潮。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对社会福利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但此次改革仍然具有“生产性社会福利”特征，仍然将自救作为主要目标，这也在客观上将家庭放在福利建设的首位。

(2) 民众的福利期待。福利文化不但可以从福利发展历史的角度去分析，也可以从民众期待的角度进行考察。这是因为不同体制下的福利文化会深刻影响民众对福利的期待，对福利期待产生直接的作用，为此，对福利文化的分析可以借助民主期待这个指标来进行考察。由于中国大陆没有参与2006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简称ISSP）的调查，因此，本次民

众期望的福利文化比较采取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三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典型数据（见表6）。

从不同体制下的民众对福利的期待看，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具有相对的统一性。比较东亚和欧美国家地区被调查者对政府责任的期望，发现在东亚体制下民众的福利期望和欧美有较大的不同。在住房保障方面，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与西方福利国家相比，民众的期望值相对较低，表现出对政府责任的较低期待，同样的现象在健康保护、养老保障 and 环境保护等方面也有所表现。从这些方面看，东亚国家与地区的民众福利期待比西方低 10 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在调控物价和促进就业等方面，东亚国家与地区的民众表现出了较高的期待水平，超越了欧美体制的福利期待。总的说来，从整体的民众期待看，东亚国家与地区在福利期待方面表现出与西方福利体制相区别的特征，也表现出很强的内在统一性。

表6 不同体制之间民众的福利期待

国别(地区)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		美国		德国		瑞典		东亚平均		欧美平均		%
	绝对是	是															
健康	41.3	86.8	35.9	90.6	51.6	95.3	56.4	89.7	54.5	96.1	62.5	93.6	43.5	90.9	57.8	94.0	
老年	44.3	88.3	35.7	90.0	48.5	93.6	57.1	90.0	47.9	94.3	66.8	97.0	42.8	90.6	57.2	93.7	
失业	18.3	56.5	18.4	70.2	25.0	72.2	16.0	51.9	18.5	70.9	27.0	83.5	20.5	66.3	20.5	68.7	
教育	20.8	57.9	29.9	80.2	42.0	89.9	55.0	92.0	40.2	92.3	30.6	73.7	30.8	76.0	41.9	86.0	
住房	11.1	37.8	20.3	70.7	28.2	78.3	33.1	76.5	22.4	77.6	25.0	79.4	24.1	62.2	26.8	77.8	
就业	16.3	51.7	20.8	70.1	47.8	88.2	15.9	39.6	35.2	68.3	28.6	58.9	28.3	70.0	26.5	55.6	
物价	55.1	92.3	56.4	96.7	73.5	97.4	44.1	77.0	35.7	78.4	33.5	82.5	61.6	95.4	24.4	79.3	
工业	22.0	66.6	33.3	88.5	34.6	90.4	28.4	73.8	19.8	59.4	26.8	77.0	29.9	81.8	25.0	70.1	
贫富	34.3	66.0	40.5	80.6	55.4	88.9	28.6	52.2	33.7	72.1	37.2	67.7	43.4	78.5	33.1	64.0	
环境	53.5	89.7	51.0	93.3	63.5	96.0	61.8	93.7	47.2	94.2	46.6	89.5	56.0	93.0	51.8	92.4	

注：①以上的数字均为调查中的百分比，资料来源于 ISSP 数据库中“2006 年政府责任数据库”<sup>[22]</sup>。

②不同体制的代表：瑞典为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德国为保守社团主义体制，美国为自由主义体制，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为东亚福利体制。

③调查的问题为“您认为下列事项为国家必须提供的吗？”，答案按照程序划分为“绝对是”、“是”、“一般”、“不足”、“绝对不是”，为引用方便，本表只记录了回答“绝对是”和“是”两个选项的比例。

### 3. 福利差异与东亚福利

对东亚福利体制质疑的第三个方面是关于其内部是否存在分裂的子体制问题。有学者提出应该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标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福利体制具有保守主义的、再分配和民主的主要特点；而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福利体制具有强制的、残余主义的和威权主义的色彩<sup>[23]</sup>。

中国香港、新加坡往往采取政府计划的方式对整体福利体系进行构建，而日本、韩国的福利政策则多以立法为主。就解决的问题看，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福利体系更多地倾向于引导个体参与“自救”行动，政府所实行的是“小政府”的策略，只负责监督管理的基本职责；同时，两个地区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多围绕“个人责任”予以福利构造，强调个人在养老、住房、医疗等方面的自我维护。而日本、韩国则在就业引导、工资限定、特殊人群福利方面承担了更多的国家责任，展现出了保守主义的某些特点。可见，这两种福利体制类型在福利建构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性未必意味着东亚体制内部福利类型的分裂。研究进一步将两种类型的差异点与相似点进行总结，得出表 7。

从表 7 来看，“东亚福利体制”内部存在的差异性在更大范围内具有统一性。换言之，在价值理念、再分配能力、施政环境、政府作用、福利构建方式和福利供给策略方面，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

东亚福利国家类型与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福利城市类型具有一定差异。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东亚福利体制”一般特征上所表现出来的生产性特点、家庭中心特点、儒教社会特点、个人责任特点、福利水平特点和福利文化特点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从这点出发，尽管东亚内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根据国情区情具有不同的社会福利策略，但是这种类型的分裂并不能影响“东亚福利体制”的整体存在。

表7 “东亚福利体制”下不同福利类型的比较

考察项目	东亚城市福利类型		东亚国家福利类型		
	中国香港	新加坡	日本	韩国	
差异点	价值理念	残余主义	残余主义	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
	再分配能力	力度弱	力度弱	力度强	力度强
	施政环境	发达城市	发达城市	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
	政府作用	小政府	小政府	大政府	大政府
	构建方式	计划为主	计划为主	立法为主	立法为主
	福利供给策略	非盈利组织的强大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队伍	以公积金为基本特征的储蓄账户方式，国家履行基金的控制权	企业年金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方式	多元主义的福利政策
相似点	家庭作用	核心主体	核心主体	核心主体	核心主体
	背景文化	儒教文化	儒教文化	儒教文化	儒教文化
	民众福利期待	低	低	低	低
	公共性组成	政府和公共组织	政府和公共组织	政府和公共组织	政府和公共组织
	与经济关系	密切	密切	密切	密切
	福利水平	低	低	较低	较低
	个人责任	重	重	较重	较重
	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需要促进经济发展	需要促进经济发展	需要促进经济发展	需要促进经济发展

#### 四、讨论与总结

随着世界范围内福利研究交流的频繁，“东亚福利体制”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东亚福利体制”是真实存在的，主要表现为生产主义、家庭中心、儒教文化等特点；而另外部分学者则认为，“东亚福利体制”不是一个真实的概念，东亚各个国家与地区的福利不能够人为地捏合并构成一个整体。所以，对“东亚福利体制”的真实性进行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东亚福利体制”的真实存在需要证明两个问题，一个是外在独立性问题，一个是内在统一性问题。本研究主要集中到了“东亚福利体制”是否统一的命题。

研究围绕着当前学术界质疑“东亚福利体制”存在的三个重要问题展开，先后证明：①东亚各地区经济政治体制的差异不是影响福利构建的主要因素，而经济发展和政治整合等因素才会在更大程度上左右东亚国家与地区福利建设的选择。②东亚各地区具有共同的福利文化，无论是在家庭互济文化还是在民众的福利期待上，东亚各地区的福利文化均具有统一性。③东亚各地区的福利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不影响东亚各地区共同遵循东亚福利的一般特征，不影响“东亚福利体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以东亚国家和地区作为基本单位进行的研究证明，“东亚福利体制”的内在统一性是真实存在的。在“东亚福利体制”的内部，东亚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福利走向与福利发展状况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尽管在政治体制、经济状况和社会问题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东亚各国家和地区福利发展

方式有很强的一致性。东亚各国家和地区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社会认知和福利期待，这都为“东亚福利体制”的形成与推进提供了现实基础。作为“东亚福利体制”重要的组成主体，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六个国家和地区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可以证明“东亚福利体制”的客观存在。因此，对于“东亚福利体制”的研究，以及对于“东亚福利体制”优秀经验的介绍，有利于推动中国福利的有序发展和东亚国家的福利建设。

#### 参考文献：

- [ 1 ] Esping-Andersen G. Three World of Welfare Capitalism [M]. Cambridge: Policy ,1990. 17.
- [ 2 ] 埃斯平-安德森·科斯塔. 转变中的福利国家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3. 23.
- [ 3 ] Holiday I. Productive Welfare Capitalism: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n [J]. Political Studies ,2000.
- [ 4 ] Gough I. Social Policy Regim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M]. Aldershot : Elderward Elgar ,2003. 34.
- [ 5 ] Jones C. The Pacific Challenge: Confucian Welfare State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Welfare State in Europe [M]. London: Routledge , 1993. 25.
- [ 6 ] Lin K. Confucian Welfare Cluster: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Welfare [M]. Tampere: University of Tampere ,1999. 10.
- [ 7 ] [韩] 林炳铉, 高春兰. 儒家文化与东亚社会福利模式 [J]. 长白学刊, 2007 , (2).
- [ 8 ] Goodman R. , Peng I. The Eastern Welfare States: Peripatetic Learning and Nation-Building [M]. London: Sage ,1996. 3.
- [ 9 ] Huck J. K.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Welfa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elfare Systems in East Asia [A]. 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 Welfare Orientation and the State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2.
- [ 10 ] 李易骏, 古允文. 另一个福利世界? 东亚发展型福利体制初探 [J]. 台湾社会学刊, 2003 , (31).
- [ 11 ] Mishra R. Social Polic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19.
- [ 12 ] [日] 野口定久. 东亚福利社会开创的框架形成——从日本社会福利学会国际交流的视角出发 [A]. 彭华民. 2010 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东亚社会福利发展创新论坛论文集 [C]. 2010 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东亚社会福利分会, 2010. 33-41.
- [ 13 ] 熊跃根. 国家力量、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理论探索与比较分析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7 , (4).
- [ 14 ] Kim P. H. Varieties of East Asian Welfare Capitalism: The Nation-state Model of Japan ,Korea and Taiwan [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 2007 , (4).
- [ 15 ] Jones C. The Pacific Challenge: Confucian Welfare State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Welfare State in Europe [M]. Londen: Routledge , 1993. 21.
- [ 16 ] Holiday I. Productive Welfare Capitalism: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n [J]. Political Studies , 2000.
- [ 17 ] 田毅鹏. 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以中日两国为中心 [J]. 吉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 (6).
- [ 18 ] 彭华民, 顾金士. 福利国家的比较研究方法研究 [J]. 东岳论丛, 2009 , (1).
- [ 19 ] Mishra R. Social Polic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51.
- [ 20 ] 熊跃根. 国家力量、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理论探索与比较分析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7 , (4).
- [ 21 ] [日] 野口定久. 东亚福利社会开创的框架形成——从日本社会福利学会国际交流的视角出发 [A]. 彭华民. 2010 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东亚社会福利发展创新论坛论文集 [C]. 2010 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东亚社会福利分会, 2010. 33-41.
- [ 22 ] 彭华民, 龚回. 东亚和欧美民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期望的比较研究: 以六个国家地区为例 [A]. 彭华民. 2010 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东亚社会福利发展创新论坛论文集 [C]. 2010 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东亚社会福利分会, 2010. 12-33.
- [ 23 ] Kim P. H. Varieties of East Asian Welfare Capitalism: The Nation-state Model of Japan. Korea and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J]. 2007.

[责任编辑 冯 乐, 方 志]